

玉渊杂谭

歌词拿诺奖,边缘文体迎“逆袭”?

文·尼 三

10月13日,靴子落下。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音乐人、作家鲍勃·迪伦。歌词获得诺奖,一下子成了个大梗,不但连刷几屏,估计够大伙儿玩上半年的。专家说,这是一次行为艺术;做书的朋友说,出版商该哭了;有的歌星则表示一下子找回了自信。

不过,诺奖自己还是蛮正经的。诺奖词说:“鲍勃·迪伦为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带来了全新的诗意表达方式。”如有的评论家所说,鲍勃·迪伦是美国1960年代文

化的见证人和创造者。诺奖颁给他,是对西方行吟诗人传统的一种追忆和表彰,还是对诗歌、文学、音乐、艺术结合的一种表彰。不过,即便如此,在文学这个大家庭里,歌词多少是一种边缘文体。它的成功逆袭,在给我们送来欢乐之余,其实更应引发一些严肃的思考。

曾几何时,有许多韵味十足的歌词回响在耳边。比如,“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罩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再如,“一番番春秋夏,一场场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或婉约悠远,或豪气满怀,涵义耐人咀嚼,节奏、韵律也充满美感,让人相信音乐和文学天生是一对儿。那年月,一部电视剧往往带热好几首歌。现在这种情况很少出现了,当然人们的口味高了,选择多了,但包括电视剧歌曲在内的歌词水平下降了,也是不争的事实。“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这样的歌词毫无诗意,和口号有何区别,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更

是叫人不忍卒听。

戏剧影视也如此,缺乏好的剧本,没有了文学的滋养,难免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再加上观众狂吞小鲜肉的热情冲垮了细嚼慢咽文学之美的耐心,更是把文学这根支柱抽离了文艺大厦。更糟糕的是,在这样的氛围和心态下,再好的文学,似乎也很难变成优秀的艺术作品。拿近年的例子说,气势磅礴的小说《白鹿原》到了话剧舞台上变得支离破碎,在歌舞台上更是粗俗变形,就是明证。

近几年,诺贝尔文学奖备受国人关注,莫言获奖吊起了大家的胃口可能是原因之一,和久治不愈的国际大奖饥渴症也有一定关系,但更深层次的恐怕还是人们对优秀文学作品的广泛期盼。而文学是艺术的母体,繁荣当代文艺,离不开文学这个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鲍勃·迪伦获诺奖,我们尽可惊叹或调侃边缘文体的成功逆袭,但同时也应考虑文学如何在当代中国文艺格局重归本位,不为诺奖,而是为了文学以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鲍勃·迪伦歌词作品选登

Blowing in the wind 答案在风中飘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a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 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

How many years can a mountain exist Before it's washed to the sea?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doesn't see?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 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 Before he can see the sky? 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til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

中文:

一个男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一个男人 一只白鸽要翱翔多少海洋才能在沙滩安息 炮弹要多少次掠过天空才能被永远禁止 答案啊 我的朋友 在风中飘 答案在风中飘

一座山要伫立多少年才能被冲刷入海 一个人要死多少年才能获得自由 一个人要回过多少次头才能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答案啊 我的朋友 在风中飘 答案在风中飘

一个人要仰望多少次才能看清天空 一个人要有多少只耳朵才能听见人们的哭喊 要牺牲多少条生命才能知道死亡的人已经太多了 答案啊 我的朋友 在风中飘 答案在风中飘

扫一扫 欢迎关注 嫦娥公众微信号



科林碎玉

『马耕』与『牛耕』

文之下

英语中常会用“to work like a horse”来表达某人要努力工作;汉语中常用“牛一样的勤劳”“老黄牛一样的精神”来夸奖一个人。牛与马在东西方文化中有着不同的用途与地位,围绕它们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意象。从与农业相关的角度来考察这两种动物,那就是犁地了。

在古典时代与中世纪前期的欧洲,拉犁主要还是靠公牛,为何此时没有用马来耕地?学者们认为,一是当时的“两田制”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养马;二是适合马耕的技术装备尚不健全。那时的马还没有钉马掌,马蹄经不起地里各种小石头的折腾,即便不下地,日常运输也不能长途进行。

欧洲大规模使用马耕是在12世纪以后。马耕最终能取代牛耕,我想还是因为它适应社会的普遍需求。其实二者各自优劣的比较,人们通常会从成本与收益角度进行分析。13世纪农学家们的看法是:“马吃更多的燕麦,马得钉掌,而牛不用这些。因此,养马的费用比牛多4倍。而且牛的脾气更温顺,老了还可以卖个屠夫吃牛肉,而马只能卖皮,甚至有一段时期,马是不允许被宰杀的。所以,马的价值折损较大,而牛的保值性却较高。”

另外,马更容易生病,我国的农书里记载,把猴子拴在马圈里闹腾它,就是一种防止生病的措施。吴承恩给猴头孙悟空安个“弼马温”的官衔,就是这个道理。

但马的优势也很突出,首先它用途广泛,驮、骑、拉、民用、军用都可以。在速度与炫耀性消费上,马也比牛有优势多了。拥有了马,农户农闲之余还能体验下策马奔腾的感觉呢。速度就更是马的特长了,16世纪的法国农学家们高度评价马耕:“马一天干的话是牛的3倍甚至4倍”。对于农民而言,快速犁完地,当然是好事。

但是马耕比牛耕更快的论断,放在不同的社会,答案不完全一样。耕地是人与动物相互配合的协作式劳动,最终效率是两者合力的结果,不是单一由马或者人可以决定的。再后来,当现代农业机械化生产普及及时,那些推广耕地机器的宣传者们又把马耕说得一无是处。上世纪50年代,苏联作家伊林《五年计划故事》中说道:“马是所有机器中最贪食,最嘴馋的。它要嚼掉农民田里出产的一半。在乌克兰草原地方,农民为他的马一年要花费五十金镑——跟他给全家人所花费的一样多。”这是一段鼓吹集体化农业的文字,无外乎就是说集体农业可以推广机械生产,可以最大限度利用劳动工具。

再聊我国的情况。《老子》中有这样一句话:“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这是对马在农耕社会中的主要功用转化的扼要说明。对于“却走马以粪”的解释,学界前辈有充分的讨论,但

无论何种解释,都说明和平期间马的主要功用不在于军事了。也就是说,马的军事用途在我国古代是第一位的。

在中华农业文明图景中,牛耕是必备元素之一。在战国牛耕推行前,土地主要是靠“耦耕”来翻地,这是一种人力的耕地方式。孔子弟子冉耕、司马耕,皆以牛为字,就可为证。到了汉代,在北方关中地区出现“二牛抬杠”的耕地形式。再后来,随着犁具的改进,牛耕的效率越来越高。当然,农民除了用牛耕之外,也还是有用马耕地。

据《盐铁论》卷三《未通》称,西汉时“农夫以马耕”,同书卷六《散不足》记:“马行则服,止则就犁”。只是养马的成本很高,不是普通农家可以支撑的,据称当时养马一匹“当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故而中原农区少有马耕,其主要是在边缘地区,或者少数民族地区存在。

明代文人徐渭把自己的不得志,说成“于文不幸若马耕”,由此可见在汉文化中马耕的地位了。

对于中华农业文明中不普遍使用马耕的原因,排除动物生理特点、技术因素,我认为还是主要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农耕文明周边是被游牧民族包围着的,从殷商征伐鬼方,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再到秦始皇修筑长城,至汉匈奴战争,五胡乱华,唐代与突厥的战争,宋代与西夏、金、蒙古,明代与漠北蒙古,清代对西北的用兵,桩桩件件都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对抗。这种文明的冲突是地缘政治在扩张中的交织与对抗。

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马这种动物多数时候充当的是“战车”角色。汉人用骑兵的技术天然不如游牧民族高超。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靠得就是卓越的骑兵。马是骑兵的关键,没有好马,骑兵的威力会大打折扣。在不同兵役制度下,对马的管理方式也是不同的。马匹,尤其是好的马匹,在战时要被国家征用。不仅如此,历代对马的管理有一套制度,叫“马政”。由此也可体会到马的军事用途更被重视,正如牛的农业用途被重视一样。《商君书·去强》说:“强国知十三之数:境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取食之数,利民之数,牛、马、初粟之数。欲强国不知强之三者之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为了强国,政府需掌握确切的“牛、马之数”,这就是“农战”思想的体现。

且不说马耕了,就连牛耕到后来在南方人口稠密的农业区也不那么普遍了。取而代之的是“人耕”或用“铁塔翻耕”。黄宗羲在《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五中对“人耕”这种形式表现出惊奇态度的同时,也分析了缘由,他说:“人耕,其法用三人一杠,杠中依于犁,一人柄后,一人揭前,又一人别绳牵牛犂,大抵穷而通牛之变”。此外还有如:土地零碎化,劳动力多,养牛成本大,每家拥有耕地少,牧地被侵占,养牛的空间被压缩等。曾雄生先生从“放牛”到“磨牛”的视角,来解读了我国“跛足农业”形成的原因,就是对此最好的说明。试想连对空间要求不高的牛,就要拴着养了(宋代农学家陈旉出的主意,就是在破塘的埂上种树,用来绑牛)又哪里还有足够的空间养马呢?要是有的,恐怕也只有在地关系相对宽松的山区了。故有俗语“放马南山”。



秋水(摄影)

余虹

品筑春秋

元代建筑:不拘小节草原风

文·填下乌贼



公元1258年春,蒙古开平府,庄严肃穆的大安阁里黑压压地坐满了数千人,正在听大汗里两个出家人大声地辩论。

右首青年喇嘛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不紧不慢地向对面的中年道士:“既然《史记》和《道德经》都没有李耳先生点化佛祖的记载,那么所谓的《老子化胡经》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中年道士哑口无言。忽烈向尚书姚枢点了点头,姚枢站起身来,大声地宣布:“此次佛道大辩论,最终结果:喇嘛教胜,全真教负!”

青年喇嘛八思巴面有得意,而全真教教主李志敬则面如死灰。这是中国宗教史上著名的“戊午佛道大辩论”,此役之后,元朝将喇嘛教奉为国教,而此前一直备受尊崇的全真教则地位一落千丈。

我们今天,还能在元代古建筑上找到全真教和喇嘛教的影子。

山西芮城永乐宫,始建于元定宗贵由汗时期,是全真教的三大祖庭之一。

永乐宫规模宏伟,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龙虎殿、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四座高大的元代殿堂。这些殿堂一方面吸收了宋代《营造法式》的施工指导,另一方面采取了辽金时期的“减柱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元代风格。

四座建筑里,龙虎殿尤其值得一说。

龙虎殿,又称无极门,始建于公元1294年,最早是永乐宫的山门,单檐庑殿顶,面阔五间,二稍间封为小屋,明间和两次间兼做戏台,台口宽12.4米,进深7

米,台基高1.55米。无极门戏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山门戏台和搭板戏台,被尊称为“戏台鼻祖”。

全真教的另外一处元代建筑是开封延庆观玉皇阁。

玉皇阁,又叫通明阁,占地约76平方米,高18.25米,始建于公元1233年。玉皇阁坐北朝南,分为上、中、下三层,下层为正方形,外部为四坡檐顶;中层为八角形,用碧绿的琉璃瓦砌出了连续的山花;上层为一个八角形的亭阁。玉皇阁采用砖墙穹顶结构,在道教建筑的基础上,又引进吸收了蒙古族建筑、伊斯兰教建筑的特色,形成国内独一无二汉蒙融合建筑,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元代的喇嘛教建筑代表,首推北京的妙应寺白塔。

元代之前,中国宝塔主要有两种形式:楼阁式和密檐式,发展得都相当成熟了。进入元代以后,又引进了一种新的形式:覆钵式,妙应寺白塔就是国内最大的覆钵式宝塔。

这座大白塔由尼泊尔建筑大师阿尼哥于公元1279年建成,塔高50.9米,由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组成。塔基高9米,面积1422平方米,分为三层,上砌基座,联结塔身;塔身俗称“宝瓶”,形似覆瓶,上有“亚”字结构小型须弥座,顶端为一直径9.7米的华盖,华盖四周悬挂着36副铜质风铃,清风徐徐吹动,铃声“叮当”悦耳;华盖之上,就是一座高约5米的鎏金塔刹,呈须弥座式,竖立着十三重相